

# 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成长逻辑

## 市场机制、政策干预与知识流动的多维分析

李昌奎

香港产教融合研究所

**摘要** 在我国教育强国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双重背景下，产教融合型企业作为连接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的新型组织形态，日益成为推动技术转化、人才培养和区域创新的重要力量。本文以“市场机制—政策干预—知识流动”三元结构为理论支点，系统分析了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成长路径与运行逻辑。研究发现，市场机制通过人才需求牵引和竞争压力强化企业创新驱动，政策干预通过制度支持与资源供给塑造企业发展的环境基础，而知识流动则作为中介机制，贯穿企业的能力重构与价值实现全过程。本文进一步构建了“机制—阶段—路径”三层嵌套模型，揭示了产教融合型企业从制度启动、市场调适到融合跃升的阶段性演化机制。研究认为，三重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企业成长的核心动力源，应通过优化市场激励、设定政策边界、构建知识生态三重路径，推动产教融合型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丰富了教育与产业协同组织的理论研究，也为教育治理与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践参考。

**关键词** 产教融合型企业；市场机制；政策干预；知识流动；成长逻辑

**DOI** <https://doi.org/10.6938/iie.070301> **文章编号** 2664-5327.2025.0703.1-11

**收文记录** 收文：2025年3月5日；修改：2025年3月11日；发表：2025年3月15日 (online)。

**引用本文** 李昌奎. 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成长逻辑：市场机制、政策干预与知识流动的多维分析 [J]. 产教融合研究, 2025, 7(3):1-11. <https://doi.org/10.6938/iie.070301>.

**产教融合研究** ISSN 2664-5327 (print), ISSN 2664-5335 (online), 第7卷第3期, 2025年5月31日出版 (print), <https://iie.hk>, <https://cpcl.hk>, 电子信箱: wtocom@gmail.com, kycbshk@gmail.com.

**The Growth Logic of University-Industry Integration Enterprises: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Market Mechanisms, Policy Intervention, and Knowledge Flow**

Changkui LI

*Hong Kong Integr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transition toward an education-driven innovation system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university-industry integration (UII) enterprises have emerged as key organizational entities bridgi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ial actor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ripartite analytical framework—comprising market mechanisms, policy intervention, and knowledge flow—to explore the dynamic logic underpinning the growth of UII enterprises. The study finds that market forces stimulate innovation through demand-driven alignment and competitive pressure; policy intervention provides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resource guarantees; and knowledge flow acts as a mediating mechanism that facilitates capability development and value realization. Based on a synthesis of case studies and theoretical modeling, the paper proposes a three-stage evolutionary model—Institutional Initiation, Market Adjustment, and Integrated Leap—demonstrating how the interplay among the three mechanisms drives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cross different development phases. The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nd offers actionable insights for policymakers aiming to fost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university-industry ecosystem.

**Keywords** UII Enterprises; Market Mechanism; Policy Intervention; Knowledge Flow; Growth Logic

**Cite This Article** Changkui LI. (2025). The Growth Logic of University-Industry Integration Enterprises: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Market Mechanisms, Policy Intervention, and Knowledge Flow.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7(3):1-11. <https://doi.org/10.6938/iie.070301>

© 2025 The Author(s) 产教融合研究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SN 2664-5327 (print), ISSN 2664-5335 (online), Volume 7, Issue 3, published by Creative Publishing Co., Limited, <https://iie.hk>, <https://cpcl.hk>, E-mail: [wtoecom@gmail.com](mailto:wtoecom@gmail.com), [kycbshk@gmail.com](mailto:kycbshk@gmail.com).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一、引言

### (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转型,“产教融合”逐步成为连接教育供给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桥梁。在国家“双创战略”以及“新质生产力”等战略引领下,一类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产教融合型企业快速崛起,成为推动技术转化、人才培养与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产教融合型企业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又是产业链条的运营主体。这一复合性特征使其成长逻辑显著不同于传统工商企业或单纯的教育机构。其成长过程不仅受到市场机制的驱动,更深度依赖政策引导与知识资源的流动与整合。面对产业结构调整、高等教育普及、技术更迭加速等时代背景,产教融合型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日益关键的角色,亟需理论上的系统分析与机制层面的经验提炼。

尽管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律文件，如 2022 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 2035 年）》等，推动政产学研协同发展，但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成长路径、组织机制及其与政策和知识系统的交互关系仍缺乏深入研究。为此，本文试图从“市场机制—政策干预—知识流动”三维视角出发，系统探讨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成长逻辑，以回应现实发展需求与理论研究空白。

## （二）研究问题

本文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第一，市场机制如何影响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成长？即在地市场需求变化、产业升级与竞争压力驱动下，企业如何通过产品服务、组织模式与价值链配置实现成长。第二，政策干预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探讨政府在资源配置、制度构建和激励机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政策与市场之间如何互动塑造企业成长轨迹。第三，知识流动如何促进企业创新与竞争力？分析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知识交换、人才流动、技术转移等过程如何影响企业的技术积累与组织学习。这些问题将为本文构建多维互动的企业成长机制模型提供理论支撑。

##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理论层面，借鉴制度经济学、创新系统理论与知识治理理论，构建“市场—政策—知识”三元互动框架。在实证层面，通过典型企业案例研究与行业数据分析，探究各要素如何协同作用于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成长过程。

具体方法包括文献综述、政策文本分析、企业访谈与定量数据处理。在案例部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如职业教育集团、产业学院运营实体、校企联合平台）进行成长历程剖析。在数据方面，主要来源包括国家和地方教育及产业政策文件、公开发布的企业年报与财务数据、高校校企合作统计资料、政府教育和科技投入数据等。部分数据由企业调研和访谈获得。

## （四）研究贡献

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理论层面，构建了涵盖市场机制、政策干预与知识流动的企业成长逻辑框架，突破了将企业成长视为单一市场行为的研究视角，强调了制度与知识环境的重要性。其次，在机制分析层面，揭示了政策与市场之间的协同机制，以及知识流动如何在二者之间发挥桥梁与加速器作用，丰富了产教融合领域的组织行为研究。再次，在实践层面，结合案例与经验分析，总结出多种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成长路径，提出优化政策环境、增强市场响应与提高知识转化效率的路径建议，为政府制定支持政策与企业优化成长策略提供实证基础。最后，本文也为未来有关产教融合、教育经济、产业组织转型等研究提供了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上的基础，可为中国在“双元制 + 创新驱动”融合路径中积累更系统的经验总结与国际话语表达能力。

# 二、市场机制对产教融合型企业成长的作用

## （一）市场需求驱动：产业升级与人才结构调整的内生动力

在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过程中，技术密集型与服务导向型产业不断扩张，推动产业结构迈向高端化、智能化。这一演进趋势使得企业对技术技能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的需求快速增长,形成了对教育资源的新诉求与对人才供给结构的新挑战。产教融合型企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其根本动因是对“精准匹配型人才”的结构性渴求。

与传统教育机构相比,产教融合型企业更贴近产业一线,对岗位技能变化的反应更加灵敏,能够通过课程设置、培训服务、校企共建等方式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这一市场逻辑不仅推动了产教融合企业的快速成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高等教育供给滞后、课程内容与实践脱节等问题。因此,市场需求的变化本身成为了产教融合型企业组织演化与战略更新的重要内生变量。

## (二) 企业竞争与创新:市场环境中的生存博弈与能力建设

在开放型市场经济环境中,产教融合型企业不仅需要面对来自传统教育机构的竞争,也需在其他同类融合企业中争夺高校资源、政策资源与企业订单。竞争机制促使企业不断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强化组织柔性与服务定制化能力,推动其在教育服务、研发合作、职业培训、技术平台搭建等多方面实现差异化发展。

这种市场导向的竞争机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企业需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推动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另一方面,也需构建自身的知识积累机制,强化产品研发、课程开发与教学模式创新。在多数成功的产教融合企业中,内部设有专门的技术研发部、教研协同体或实践转化团队,以形成“知识—能力—服务”的快速闭环机制。

此外,竞争也促使企业强化品牌建设与平台拓展意识。通过在行业内形成良好的教育服务口碑、毕业生就业质量声誉以及与龙头企业的合作网络,产教融合型企业往往能够在竞争中获取持续成长的资源基础。这种基于市场表现的竞争机制,是其走向规范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的重要制度土壤。

## (三) 资本与投资:金融机制对企业成长路径的催化效应

资本力量在产教融合型企业成长过程中同样扮演关键角色。一方面,企业的早期发展往往依赖于政府引导基金、高校资本注入或产业基金支持;另一方面,随着企业规模扩展与服务体系完善,其融资方式逐渐呈现市场化趋势,包括风险投资、股权融资、项目联合投融资等。

近年来,随着职业教育、数字教育、技能培训等领域受到资本市场关注,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成功获得了A轮、B轮融资或完成新三板、科创板的挂牌。资本的注入不仅缓解了企业在基础设施、技术研发、师资建设等方面的资金压力,也推动了企业对组织架构、财务制度与治理结构的全面升级。

值得关注的是,资本对于企业成长的作用不只是提供资源,更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企业的战略导向。在投资方的推动下,许多企业将自身发展目标从“合作型教育服务提供者”转向“平台型教育解决方案运营商”,构建跨区域、跨行业的教育生态链。这种以资本为杠杆的扩张路径,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市场抗风险能力与系统整合能力。

## (四) 案例分析:不同市场环境下企业成长路径的比较

以A市某人工智能实训企业和B省某化工产业学院为例,两家产教融合型企业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成长路径。A市企业处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区域,面临高度市场竞争压力。其成长战略以“快速对接产业需求”为核心,主要依赖对企业技能需求的快速反应机制,通过自主研发教学系统、推出岗位定制型课程包、与头部科技公司合作共建实践项目,快

速扩大市场份额。相比之下，B省的产业学院则处于传统制造业转型期，区域内政策支持强但市场竞争相对缓和。其成长模式更多依赖政策导向与高校资源协同，强调与地方政府共建“校政企合作平台”，围绕区域支柱产业（如绿色化工、新材料）设计课程体系，推进校企双主体运行模式。虽然其盈利模式不如A市企业灵活，但在地方治理结构中嵌入度高，发展相对稳健。

这两类案例表明，产教融合型企业在不同市场环境中的成长路径具有显著差异性。强市场导向型企业倾向于通过技术与服务创新谋求超额回报，政策资源密集型企业则依赖稳定制度环境稳步推进组织进化。但无论哪种路径，企业的持续成长都依赖于其是否能构建起可持续的知识网络、适应产业结构演化，并在市场中形成清晰的价值定位。

### 三、政策干预对产教融合型企业成长的影响

#### （一）政策支持的主要类型

在我国推进产教融合的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方，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政策干预手段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从中央到地方，政策干预大体可归为以下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资金补贴与税收优惠。政府通过设立职业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产教融合引导基金、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等，为企业提供项目申报资助、运营补贴与税收减免等直接财政激励。这类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参与教育服务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企业在教育环节的积极性。

第二，产教融合示范区与试点制度。国家先后批准设立多批国家级和省级产教融合试点城市、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鼓励高校与企业组建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产业学院等，政策配套涉及土地、财税、评估制度、资源配置等多个方面，形成空间上的政策洼地效应。

第三，产业政策与行业标准制定。随着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绿色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政府也通过制定技能标准、工种目录、人才分类制度等，间接引导企业开展与重点产业方向相匹配的教育与培训活动，推动产教融合向战略性产业嵌入。

以上政策支持体系为产教融合型企业的设立、成长与扩张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环境基础，是其快速发展的政策土壤。

#### （二）政策干预的积极作用

政策干预在产教融合型企业成长中主要发挥两方面的正向作用：

第一，弥补市场失灵，推动教育与产业的结构性耦合。高质量人才供给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企业在短期内往往缺乏动力单独承担教育成本，特别是在职业教育领域，因见效周期长、收益不确定，企业参与意愿相对较低。政府通过政策补贴和机制设计，将企业行为纳入制度激励体系之中，有效提升了教育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效率。

第二，促进企业与高校的组织协同与模式创新。政策干预促使企业不再是教育的被动需求者，而成为课程设置、人才选拔、教学评价的深度参与者。例如，在“现代学徒制”“双元制试点”等项目中，政策要求企业承担实训基地建设、企业导师提供与课程嵌套的任务，引导企业构建教育模块化能力，推动其从“产业组织”向“知识组织”的转型。

通过这些机制，政策不仅在财务层面提供支持，更在组织结构与行为模式上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

### （三）政策干预的潜在问题

尽管政策干预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与结构性风险：

第一，政策过度干预可能导致市场扭曲。部分企业在政策密集型区域中存在“依赖性成长”倾向，即将政府补贴、项目中标作为主要经营目标，而非围绕市场需求自主构建服务能力。这种行为将导致资源错配、创新动力不足，甚至形成“政策套利”的灰色空间。

第二，政策碎片化与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制度成本。当前部分地方政策存在重复建设、指标导向过强、考核频繁变动等问题，使企业难以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特别是民营产教融合型企业，容易陷入“反复申请—反复调整”的资源循环，削弱了其在产品、技术与人才链条上的长期布局能力。

第三，政策激励机制与绩效评价体系未能有效联动。部分地区政策支持项目以“项目立项数”“合作次数”为主要考核依据，忽视了产出质量、产业转化效果与企业贡献度的综合评价，导致企业“重立项、轻运营”，资源浪费与低效投资问题突出。

这些问题提示我们，在强化政策支持的同时，也需注重“有限干预、精准激励”，避免政策功能异化。

### （四）案例分析：国内外政策实践比较与启示

以中国A省和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为例，两地在政策推动产教融合型企业发展方面体现出不同路径。A省作为国家级产教融合试点省份，通过设立省级产业学院专项基金、鼓励高校与龙头企业联合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设立区域技术技能人才供需信息平台等，推动企业从参与者向治理主体转变。但在执行层面仍存在项目标准不统一、政府主导过重、绩效导向不明晰等问题，部分企业“政策依赖性”较强。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则采用“政府提供框架、市场自主运作”的政策逻辑，通过明确企业培训责任、设立行业培训标准、引导行业协会参与评估和认证等方式，形成“国家标准—行业自治—企业执行”的协同机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更多来自法律义务与产业联盟激励，依赖性较低，持续性较强。

比较两者经验可见，政策在推动企业参与教育的过程中，应逐步由“全面介入型”转向“制度建构型”，通过制度设计而非直接资助引导企业行为，确保产教融合生态的自主性、长期性与适应性。

## 四、知识流动对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的影响

### （一）知识流动的主要类型

知识作为推动企业持续创新与能力构建的核心资源，在产教融合型企业中尤为关键。这类企业天然处于知识创造、转化与扩散的交汇点，其成长离不开与高校、科研机构、技术平台以及人才个体之间的知识交互。当前，产教融合型企业中知识流动主要呈现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产学研合作渠道。企业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实验室、技术中心、产业学院等形式，实现基础研究成果向应用技术的定向转化。这类合作有助于企业获取前沿性知识、搭建技术攻关平台，是实现从“经验主导”向“科技赋能”转变的重要路径。

第二，技术转移与专利共享机制。通过专利交易、技术许可、技术入股等方式，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知识产权成果可由企业引进并实现产业化。在政策支持与平台机制的推动下，一些地区已初步形成“知识成果转让—产品迭代—技术再升级”的循环体系。

第三，人才流动与经验传承。高校教师、科研人员进入企业兼职或转岗，学生实习与就业后的内部培训机制，以及企业人员参与高校课程开发与教学指导，构成了双向人才与知识流动的常态机制。这种“人随知识动”的方式，有助于将隐性知识结构化转移并落地转化。

## （二）知识流动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机制

知识流动在产教融合型企业中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组织学习能力与产品服务迭代能力，其作用机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强企业的技术积累与突破能力。通过与高校的合作，企业可获得研发前沿的原始知识和方法支持。例如，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领域，企业在合作中不仅获得成果使用权，更获得研发逻辑、方法论与技术路线的系统性迁移，从而实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跃升。

第二，提升企业的知识吸收与再创新能力。知识流动不仅是知识的“进入”，更是企业“吸收”“转化”“再造”的过程。企业通过组织结构的设计（如设立知识转化部门、研发共享平台）与制度化机制（如绩效联动、合作评估、专利激励等），逐步建构起自身的知识治理能力，形成“内化—组合—再创新”的能力基础。

第三，促进企业产品与服务的快速迭代。产教融合型企业因服务场景特殊，需要对教育需求、产业技术与客户偏好保持高度敏感。知识流动为其提供及时反馈与前沿技术，使其能够更快实现产品体系与服务模型的升级，保持在教育技术与产业服务交汇处的市场优势。

## （三）知识流动面临的主要挑战

尽管知识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价值，但在实践中，产教融合型企业仍面临诸多瓶颈与障碍：

第一，企业与高校之间存在结构性的信息不对称。高校关注学术前沿与基础研究，企业关注应用落地与市场转化，两者的评价体系、时间节奏与成果目标往往存在张力，易造成“合作空转”或“合作失衡”。部分企业对知识成果的真实价值、适用边界缺乏判断力，导致投入无效；部分高校则缺乏对企业技术场景与组织流程的深入了解，导致成果难以落地。

第二，知识产权保护与激励机制仍不健全。在知识成果的归属、分成、转让等方面，相关制度尚不完善，导致企业在引入外部知识时存在“产权焦虑”，而高校在对外转化时也面临“成果流失”担忧。部分地区仍缺乏专业的技术经纪人、知识价值评估机构等中介力量，使得知识转移流程成本高、效率低。

第三，隐性知识的转移难度较大。企业真正需要的往往是操作经验、流程方法、问题场景等隐性知识，而这些知识依赖人力流动与长期互动，难以通过文件、合同等标准化方式完成迁移。当前许多高校尚未构建起针对隐性知识提取、编码与共享的系统机制，限制了知识流动的深度与广度。

## （四）案例分析：典型企业的知识流动机制实践

以 C 市某智能制造产教融合型企业为例，该企业与本地高水平工科高校合作共建“智能装备协同创新平台”。平台设有联合研发组、实训工作坊与知识共享数据库，由高校专家与企业工程师共同承担项目任务，所有研发成果通过双边协议明确知识产权归属，形成了以“任务牵引—

联合攻关—项目转化”为路径的稳定知识流动机制。

另一案例是D省某高职院校主导的现代物流教育集团，其核心企业通过将内部运营系统开放给教师与学生，提供“数据开放+真实任务+指导师资”的沉浸式教学环境。该机制打通了课堂与现场之间的知识屏障，使得技术标准、操作流程、客户服务知识得以在教学过程中实时更新、有效迁移，企业也因此获得了一批快速适应岗位的复合型技术人才。

这些案例表明，知识流动机制的成功构建需具备两个前提：一是企业与高校之间存在稳定的利益共享机制，能够共同承担研发风险并共享成果收益；二是建立了结构化的知识协作平台，支持从“人”到“组织”的知识持续积累与再利用。知识不只是流动，更应实现价值嵌入与系统再生。

## 五、市场机制、政策干预与知识流动的互动关系

### （一）市场与政策的协同作用：二元驱动下的企业成长框架

在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与政策干预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互为补充、相互嵌套的制度力量。从现实运行逻辑看，市场机制提供需求牵引与资源配置功能，而政策干预则发挥制度保障与环境塑造作用。两者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功能，形成“市场—政策二元驱动”格局。

在企业初创阶段，政策干预往往起到信号引导与风险缓冲的功能，帮助企业确立发展方向、争取资源支持，缓解市场失灵导致的教育资源投入不足问题。随着企业进入扩张期，市场机制逐步成为主导力量，通过竞争压力、客户反馈与资本投入，推动企业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提高服务效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此外，市场反馈反过来对政策工具的精准化与动态调整也形成“倒逼机制”。通过就业数据、订单培训效果、服务满意度等反馈，政策制定者能够及时识别资源错配、制度盲点与激励偏差，并进行政策再设计。这种市场与政策之间的协同调整机制是产教融合型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

### （二）知识流动在市场与政策机制作用下的演变逻辑

知识流动作为连接市场信号、政策资源与企业组织内部结构的中介机制，其形式、路径与效率高度依赖于市场环境的活跃程度与政策支持的系统性。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知识流动呈现出问题导向、应用聚焦的特征。企业基于市场反馈寻求解决方案，推动“从需求出发”的技术开发与人才引进。例如，企业为了应对技术更新带来的岗位技能重构压力，主动与高校建立短期项目合作机制，快速吸收新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类知识流动的特点是时效性强、目标集中，但也可能存在碎片化、深度不足的问题。

在政策干预机制作用下，知识流动则呈现出制度导向、平台牵引的特征。政策往往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组建联合平台、评估项目绩效等方式，构建稳定的知识合作载体与协作机制。例如，地方政府设立产教融合试点区，要求企业与高校共建“技术创新中心”，使得知识交流制度化、结构化，增强知识协同的可持续性。

然而，只有当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形成联动反馈，知识流动才能实现从“项目协作”向“系统耦合”跃升。有效的政策应识别并释放企业的知识需求，而动态的市场反馈又能帮助知识供给

更精准对接，从而实现知识流动的方向性、连续性与深度跃迁。

### （三）综合分析：产教融合型企业成长的动态逻辑模型

综合前述分析，本文提出一个包含市场机制、政策干预与知识流动三重耦合结构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成长逻辑模型。该模型揭示了企业从初创到扩展、再到成熟阶段中三重机制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

第一阶段为制度启动期。政策通过财政补贴、制度授权与平台建设等方式引导企业设立，弥补教育服务的市场空白，激活企业进入教育领域的意愿。此阶段知识流动主要以“政策牵引下的项目合作”为主，流动路径短、依赖制度支持。第二阶段为市场调适期。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中逐步发现教育服务的细分需求，通过课程优化、服务升级、平台运营等方式形成差异化定位。知识流动开始与市场反馈高度耦合，企业通过问题导向的合作、实践型的研发形成自主知识积累。第三阶段为融合跃升期。企业在市场适应中形成稳定的知识结构与制度优势，并通过平台机制输出其教育服务模式，向其他地区、行业或教育层级扩展。此阶段政策作用更多体现为环境营造与制度保障，知识流动演变为企业组织内部的“制度化知识链条”，实现内生长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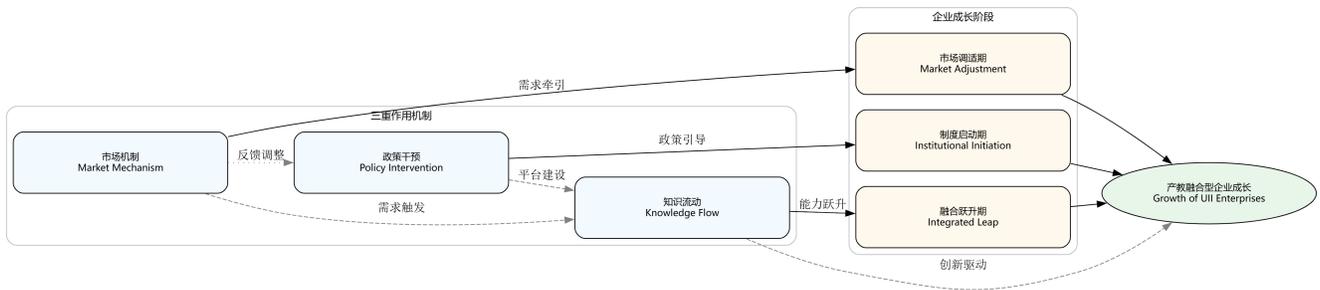


图 1: 产教融合型企业成长的三元机制模型

在该模型中，市场机制驱动企业形成战略定位与产品创新能力，政策干预提供必要制度环境与资源引导，知识流动贯穿其中，作为协同媒介与创新催化剂，共同构成了产教融合型企业成长的动态系统。模型强调三要素在不同阶段的相对权重与耦合方式具有阶段性差异，需因地制宜、因时而动地构建制度与组织策略。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研究总结

本研究聚焦于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成长逻辑，围绕“市场机制、政策干预与知识流动”的三重结构展开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旨在厘清多重机制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并构建一个能够解释企业从生成到跃升的系统模型。首先，在市场机制方面，研究指出，市场需求变化、高水平人才结构性短缺和产业竞争加剧是推动产教融合型企业诞生和扩张的内生动力。企业通过差异化服务、快速迭代、品牌建设等方式获取竞争优势。其次，在政策干预方面，研究揭示，政策不仅在企业早期提供财政与制度支持，更通过构建产教协同平台、设定准入与激励机制，塑造了企业成长的制度边界。然而，过度干预与政策依赖风险也需引起重视。再次，在知识流动方面，研究强调其

在技术创新、能力重构与组织学习中的核心作用。知识流动不仅是一种要素配置，更是一种组织能力形成的过程，尤其在产教融合型企业中体现出平台化、项目化、人才化的特征。最后，研究综合提出了一个三元耦合模型，解释了企业在制度启动、市场调适与融合跃升三个阶段中三重机制的主导角色与协同路径，丰富了产教融合组织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

## （二）政策建议

基于研究发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期优化制度环境，支持产教融合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第一，完善市场激励机制，释放企业参与教育的内生动力。政府应在制度上保障企业的合理利润空间与知识产权权益，推动教育服务市场化、项目化，鼓励企业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设计等方面拥有更大自主权，并支持其与产业链上下游形成共生型创新生态。第二，设定合理的政策干预边界，提升制度引导的精准性与协同性。政策制定应从“普惠式补贴”转向“绩效导向扶持”，建立“项目跟踪—过程评估—结果反馈”机制，推动政策从静态配置走向动态迭代，防止企业路径依赖与资源浪费。第三，构建高效的知识流动机制，推动企业组织能力再生产。建议推动知识流转制度建设，如联合研发基金制度、高校教师入企支持机制、技术经纪与知识治理中介机制，打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技术、经验与人才流通链条，形成可持续的“知识生态系统”。第四，推动区域级产教融合生态圈建设，实现从点状试点向系统化布局转型。政府可依托地方产业优势，构建区域级产教融合“平台+联盟+制度”体系，统筹布局高校、企业、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多元主体资源，提升整体集群效率与知识协同水平。第五，建立数据驱动的政策反馈机制，提升公共治理能力。依托数字化平台，推动就业流向、技术更新、企业表现等多源数据的整合应用，形成“政策试点—企业行为—市场反馈—制度优化”的数据闭环，提升政府对产业教育融合的精准治理水平。

##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在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关于产教融合型企业成长的三元耦合模型，但仍存在以下局限：一是数据获取的可得性与完整性仍受限，部分分析结论依赖典型案例的解释力，未来可结合更大样本的量化研究进一步验证模型的适用性；二是跨区域、跨产业的异质性差异尚未充分展开，尤其在资源禀赋不同、制度环境差异明显的地区，三重机制之间的耦合逻辑可能呈现多样化路径，有待进一步分类比较研究；三是本文尚未深入探讨产教融合型企业在国际视野下的成长模型，未来可结合全球南方经验与OECD国家的制度范式，拓展对知识治理、技术传播与教育市场多样性的理解。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引入多主体博弈模型、制度演化模拟技术与人工智能辅助分析工具，构建动态可视化的企业成长路径图谱，推动产教融合研究迈向机制可视、过程可控、政策可调的知识治理新阶段。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大省要挑大梁为全国发展大局作贡献 [N]. 人民日报,2025-03-06(01).
- [2] 习近平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 [N]. 人民日报,2014-06-24(01).
- [3] Rauner F. Introducing Du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Europe: A Reform Strat-

- egy[A]. In: Handbook of Fundamentals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C]. Singapore: Springer, 2024. DOI:10.1007/978-981-97-0987-8\_35.
- [4] Šćepanović V, Martín Artiles A. Dual training in Europe: A policy fad or a policy turn?[J]. Transfer: European Review of Labour and Research, 2020, 26(1): 15-26. DOI:10.1177/1024258919898317.
- [5] Etzkowitz H, Leydesdorff L. The Triple Helix—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 A Laboratory for Knowledge 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J]. EASST Review, 1995, 14(1): 14-19.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480085>.
- [6] Heinemann H N, Wilson J W, Heller B R, Craft M. Cooperativ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1982, 19(1): 1-14. <https://wilresearch.uwaterloo.ca/Data/FileDownload/1919>
- [7] 葛道凯, 徐守坤, 沈洁, 汤瑞丽. 普通高校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理论探源、框架建构与实践超越[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5(2): 8-13.
- [8] 陈立斌, 赵莉莎, 王小华.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等教育产教融合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5(1): 111-116.
- [9] 杨秋月, 李小凤.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组织发展的制度嬗变与转型路径——基于组织社会学视角的分析[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5(2):132-137.
- [10] 李梦卿, 刘开亚. 互惠理论视域下产教融合相关主体角色关系及功能研究[J]. 现代教育管理, 2025(2): 109-118.
- [11] 景安磊, 郝薇薇, 叶齐炼. 民办职业本科产教融合的发展模式及运行机制——基于 23 所民办职业本科教育质量报告的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25(3): 86-93.
- [12] 马廷奇, 王思瑶. 现场工程师核心能力培养的理论逻辑、行动框架与实践进路——基于产教融合场域的审视[J]. 现代管理教育, 2025(3):106-116.
- [13] 陈亮, 胡艳玲.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赋能产教融合的内涵特征、运行机理与高质量发展路径[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5(2): 27-35.
- [14] 李昌奎. 产教融合的理论框架构建——基于人力资本、制度经济学与创新网络的综合分析[J]. 产教融合研究, 2025,7(2):1-14.<https://doi.org/10.6938/ie.070201>.
- [15]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1): 1-17.
- [16] Becker, G. S.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M]. 3rd ed.pp15-2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17] North, D. C.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3): 359-368.<https://www.jstor.org/stable/2118057>
- [18] Powell, W. W.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0, 12: 295-336.

(责任编辑: 孙强 邮箱 wtocom@gmail.com)